不想出现“莫言热” 期待引发“文学热”

——莫言答中外记者问

▲10月12日，莫言在接受采访。□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逄春阶

因为莫言，很多人知道了长有大片大片红高粱的高密；因为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故乡高密因而又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因为莫言在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时恰好就在高密，这里立即成为了各路媒体追逐的焦点之地。最近几天，一直不断有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到高密，这其中，包括世界知名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瑞典国家电视台、日本每日新闻等国外媒体。到10月12日中午，聚集到高密期望采访莫言的媒体已达50多家。

在媒体的要求下，本来10月11日晚间已经与记者见过一次面的莫言，在10月12日下午又举行了一次记者见面会，针对中外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记者：有人说，莫言是站在权力的角度看社会，对此您怎么看？

莫言：所有的批评，在他们的角度看，都是有道理的，但我看就没道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我抄写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难道抄写过这个，就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耻辱的事情。毛泽东的《讲话》，是历史文献，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它对推翻腐朽的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承认，今天再看这个《讲话》，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性。所以，像我们这一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就试图突破这个局限。我觉得，现在很多在批评我的人，并没有看过我的作品。我的作品，与当时很多流行作品大不一样。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是要冒着很多大风险的。但突破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如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观点，我还是认可的。有人拿这件事批评我，甚至辱骂我，这让我没有想到。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政治奖，它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作家的创作，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就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员，肖霍洛夫是前苏联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为千万人阅读。

我的作品，着重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限制。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显然要比那些批评我的人高明。一个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我认为，写作就是在良心指引下去面对所有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读过我书的人，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阴暗面的批评非常猛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一直在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

记者：高密东北乡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我与所有人对待故乡的情感都一样。我们经常在故乡可能不觉得什么，但离开之后，就会有种魂牵梦萦的情怀。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乡土作家，作品当然不会脱离故乡。当然，所熟知的乡土也有写尽的时候，要对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

我虽然没有创作城市题材的作品，但城市对我的影响已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只是没有明确指出那个城市是北京还是香港而已。而且，现在的乡土，与30年前的乡土也已不一样，已经是城镇化的乡土，尽管与大城市还有区别。

记者：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文学热”、“莫言热”？

莫言：不希望引发什么“莫言热”，像现在这种情形，最多一个月，希望大家赶快忘掉这个事情。至于“文学热”，则很期待。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书，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够创作出无愧于读者的作品。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有关中国出版自由的问题？

莫言：要说完全自由，当然不是。这种自由，在国外也是相对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加限制。但看看中国现在的出版物，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尺度可以说是大到让人惊讶的程度。

记者：有没有移民国外的想法？

莫言：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又怎么会离开这个国家？在我故乡，好吃的食物很多，好朋友很多。

记者：您的作品是否已经充分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莫言：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家都已非常清楚。但是，“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是对的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12月份将在瑞典举行，您会参加吗？

莫言：到时，当然要去，也会进行演讲。但讲什么，现在还没有考虑。而且，像现在这种即兴谈话，很容易不严密，不能把事情讲清楚，所以，到瑞典去的时候，会准备一份书面讲稿。

记者：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准备怎么用？

莫言：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莫言在这个农家小院里出生、成长。

莫言兄长说家史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杨国胜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他说，当年，他高考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但是家里穷，最后还是选择了管吃的师范大学，他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个子比莫言高，长得也比莫言英俊。10月12日下午，管谟贤在高密市的家中接受了我们专访。

爷爷：莫言的第一个老师

管谟贤说，我们的爷爷管嵩峰，名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我们的爷爷，既没有莫言小说《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好手。木匠活做得漂亮，所以日子过得不错。土改时定为中农。爷爷是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他能打一手好算盘，再复杂的账目也可算清。过去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不少复杂的家具器械，看过一遍他便能做出来。

“准确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管谟贤说。

奶奶：胆子比爷爷大

“《红高粱》里的奶奶姓戴，我们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管谟贤说。

管谟贤听奶奶说过，有一年，鬼子在外面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扳机，子弹从爷爷身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子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奶奶在家留守。后来，凡是与兵们打交道的事，都是奶奶出面，就是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

父亲：对教育晚辈十分严厉

“父亲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这几天把他累得不轻，记者都去找他。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好处是，他的身体硬朗。”管谟贤说。

父亲管贻范，旧社会上过4年私塾，家乡一解放就担任各种伙计，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队，到国营农场工作区，再到生产队，一直担任会计。几十年的会计当下来，积累的账册、单据成捆成箱，他可以跟村里的老少爷们说，他没贪污一分钱，没有错过一笔账。

但管贻范又是一个严厉的人，对教育晚辈十分严厉，大家都怕他，甚至他的同辈都怕他。他希望孩子走正道。莫言小时顽皮，自然挨了不少打。有一次，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做父亲的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莫言打死。后来莫言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母亲：悲苦的一生

“我母亲姓高，没有大名，我们填表都写她管高氏。她老人家一生悲苦。”管谟贤说，“她从小缠足，没有文化。日夜操劳，晚年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她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好日子来的时候，她老人家却走了。”

管谟贤说，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四个。莫言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管谟贤回忆说，母亲最苦最累的活是推磨，那也是困难时期，村里还吃食堂，母亲为了得几斤麸皮，去给食堂推磨，那时牲口都饿死了，只好用人推。母亲瘦的体重不足七十斤，和大娘婶子们合伙，两人一帮，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生粮食也不敢多吃。对母亲的这一经历，莫言专门写了一篇小说《推磨》。

大哥：莫言的文学启蒙老师

我们说大哥管谟贤是莫言的文学启蒙老师，管谟贤谦虚地说，不能那么说，我给他引了引路。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我留在家里的书，特别是高中的课本，都是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莫言非常好学，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上世纪60年代，我分到湖南一个单位，我编一本《刘禹锡诗文选》，都是寄给他，他学得很认真。莫言到部队上开始尝试写作，把习作都寄给我看，我就给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他写过好多小说，都没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叫《离婚》。

管谟贤说，研究莫言的小说，就要研究齐文化，他对蒲松龄情有独钟，莫言小说里面的神奇鬼怪，充满了浪漫主义，这都来自齐文化的熏陶。

莫言新作《我们的荆轲》将于下周问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12日下午从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获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新作、也是首部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将于下周由该公司推出，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据悉，该书收录了莫言的三个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其中，《我们的荆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剧中，荆轲刺秦是出于希望一举成名的心态，而非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

莫言的最新文集也将于本月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集包括莫言长篇系列11本，中篇系列3本，短篇系列3本，文论集2本，散文集1本。

“莫言热”延至台湾

据新华社台北10月12日电 大陆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发台湾岛内新一轮的“莫言热”。莫言的好友作家张大春说：“实至名归，莫言创造新的中国叙事体，诺贝尔文学奖看见中国了”。

11日，岛内网络、广播、电视、通讯社多种媒体即时播发了莫言获奖的消息。12日出版的多家大报更是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图文并茂报道莫言“以魔幻写实手法糅合中国乡土民间故事、历史及现代生活。”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称赞莫言“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在龙应台眼里，认识20年的莫言“一直拥抱着家乡的泥土，红高粱与他的人群，其意义非凡”。

莫言在台湾也是学术研究者的热门话题。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曾专文评价莫言，写下了“华文文坛众望所归”的评语。

●**莫言文学作品受热捧** 10月11日晚8时许，在北京学习汉语的一名瑞典女学生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选购作家莫言的文学作品。当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来到北京一些书店设立的莫言作品专柜选购书籍。 □新华社发

四访莫言

▲10月11日，本报记者逄春阶正在采访莫言。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获“诺奖”后平静如常

10月11日晚，9点多，在高密一家宾馆，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我把刊登莫言评论的大众日报递上去。莫言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小逄，逄春阶。

这是我第四次采访莫言。

获奖后的莫言，保持谦虚和朴实，丝毫不着大师的痕迹，一如往常地平静，他是个平和、淡定的山东汉子，见面会让在场的所有人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感受到山东人的朴实，莫言对所有记者有问必答，谈笑风生，从不拒绝，表现出来的谦虚让记者们很是感动。当有记者问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下一步干什么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该干么干么……引起大家会心一笑。

我特意带去了1988年首期的《十月》杂志，里面有莫言的代表作《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书，接着他谈到文学的批判性问题，莫言表示：“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立足写人，应该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他的描写自然带有批判性，真善美也要歌颂，批判也是个重要的功能。”

我问了他一个文学与酒的问题。莫言笑着说，文学跟酒很近，古代的好多文人喜欢酒，比如李白，比如苏轼，以酒为伴，酒能刺激灵感。我也写过好多关于酒的小说，比如《红高粱》，比如《酒国》。当然，酒也有不好的一面。我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

莫言与电影

2004年12月3日，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莫言，那是一个上午。莫言在书房里，我记得花了50元钱买了一个果篮，作为登门礼，我们谈了一上午。

话题是莫言与电影。莫言说，电影是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包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一个共同爱好。那个时候，看场电影是很不容易的。每年大概有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由县电影队的人在全县巡回放映。我们就张家村看了李家村看，李家村看了韩家村看，一直追到十几里地远。任何一部电影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大部分台词，你说上句，我能连上下句。

随着莫言的讲述，我的脑海里出现如下的画面：看电影毫无疑问是农村青少年的盛大节日。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所以每次听说电影来了的那种兴奋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在田野里干活的人都没有心思了。队长就扑着腰说，还早着来，天还不黑，急什么？其实队长也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啊。就跟现在球迷急着看比赛似的。吃完晚饭，常常掐着一块饼子或者地瓜就搬着凳子去抢地方。

回忆起过往岁月，莫言一脸的幸福。

莫言第一次“触电”，改编的就是《红高粱》。“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还要改成电影。”莫言说，“我当时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我对张艺谋做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很感兴趣，他作为演员、摄影已经很有名了。我们谈了统共不到10分钟。”

我问：当时你对张艺谋提出了什么要求没有？莫言说：“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作品得奖就是一个副产品

2011年7月12日上午，在高密老家，我第二次采访了莫言。采访完，莫言和夫人一起参加宴会。莫言的夫人，圆脸，我们叫她嫂子，嫂子已经有了白发。上一次见她，高密腔多，这次北京腔多了。时间可以改变部分腔调，但核心的部分没有变。可以说，嫂子是莫言的空气，嫂子是莫言故乡的一部分。看到嫂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想，莫言真有福气。嫂子说莫言，就一句：“他不爱说话”。真是莫言啊。莫言微笑。

当时《蛙》入围茅盾文学奖，莫言谦虚地表示，因为文学作品得奖就是一个副产品。“得奖了当然很好，得不着也无所谓。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老友埋下红高粱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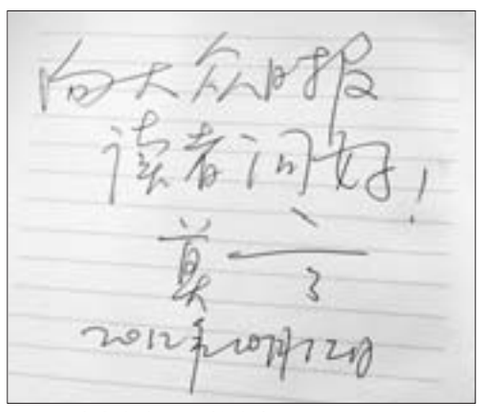
第三次采访莫言是在北京，也是2011年，我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11月25日见到莫言老师，说起了他的高密的好多老朋友，比如去世的张世家，天达药业的老总，他说，这个人太可惜了。他的才气比我大。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懒得要命，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能说能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就是这个怪人，成了莫言的莫逆之交。

莫言说：“我和世家是老乡，还是工友，一起在东北乡棉油厂当过工人，可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后来，莫言当兵走了，张世家当上了乡镇党委秘书。10年光阴，莫言成了著名作家，张世家“下海”了，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不过，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都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一次，莫言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张世家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猛然撞响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灵感之钟。

莫言回忆道：“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莫言高票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步出会场的时候，我们几个山东团的代表上前祝贺他，有个人说，莫主席好。莫言有点羞涩地咧咧嘴说，不好，不好，别这样叫，别扭。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莫言向大众日报读者问好。